

宋

坊墙倒塌以后

李春棠 著

代

城

市

生

活

长

卷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K244

8

2006

坊墙倒塌以后

宋

湖南人民出版社
李春蒙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坊墙倒塌以后：宋代城市生活长卷 / 李春棠著. — 2 版.

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06. 5

ISBN 7-5438-0517-0

I. 坊... II. 李... III. 城市史 - 中国 - 宋代 IV. K928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8136 号

坊墙倒塌以后——



代城市生活长卷

出 版 人： 李建国

总 策 划： 廖 铁

著 者： 李春棠

设计总监： 虢 剑

责任编辑： 李蔚然 穆陵宁

装帧设计：



曾 遥

出版发行：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：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：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： 410005

经 销：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 长沙健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

印 次： 2006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 640 × 970 1/16 印张： 16

字 数： 249, 000

印 数： 1-8000

书 号： ISBN 7-5438-0517-0/K. 85

定 价： 29.80 元

总序

季美林

有一个事实，本来是彰明昭著的，却几乎为所有的中外人士所忽略（黑格尔似乎谈到过），这就是：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十万里，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，最爱历史，历史典籍的时间最久，最完整，最有系统的民族，就是中华民族。从蒙昧的远古轩辕黄帝开始，一代接一代，历数千年，一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们的历史典籍从没间断过。汉代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算是一部通史。从班固以后就有了断代史。而且每一个朝代，在开国之初百废待举的丛杂混乱中，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前一个朝代修史。这就是所谓“正史”。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“杂史”、“野史”等等名堂，以致在《四库全书》中竟形成了“史”这一“库”。

我们不能说，上面提到的史籍都是完全可靠的，都是实事求是的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任何国家，任何时代，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“信史”。中国史籍何独不然？一个推翻别的朝代的新朝代，为被推翻者修史，哪里能全讲真话呢？陆游诗：“身后是非谁管得？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但是，有人称史籍为“相斫书”或“断烂朝报”，似乎又贬得有点过了头。总之，我觉得，同别一些古国，比如印度，比较起来，中国史籍还是比较可靠的，其中神话和谎话，还不算太多的。

史籍多而全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换句话说，历史有什么用处呢？

用处是很多的，意义是很大的。我们常说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”；又说“鉴古知今，鉴往知来”。类似的说法还多得很。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写了一部通史，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所谓“资治”就是“有助于统治或治理”，用意昭然。历史还有“求真”的作用。历史事实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就说它是什么样子，不歪曲，不浮夸，不有意或无意地说谎。从事实中抽绎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，从中可以看出人类前途的走向，从而指导我们的行动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尽量避免走弯路，走错路；尽量走出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，一直走向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最后走向人类大同之域。这样的意义还不够大吗？

但是，学习历史求得历史知识，却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。我们且来“鉴古知今”一下。在过去，学习历史要分清层次的。专门

研究历史的专家（我想把研究生也包括在里面），必须读二十四或二十五史，再加上一些“杂史”和“野史”等等。章学诚说：“六经，皆史也。”那么，六经也是必须读的了。至于古代一些著名的通史，当然也在必读之列。低于这个层次是一般高中等知识分子。如果他们能读《资治通鉴》和《纲鉴易知录》一类的书，就不错了。再下一个层次是一般识字不多或根本不识字的老百姓，他们大概对历史知识没有多大的兴趣，可他们的历史知识是并不少的。这大概主要归功于小说和戏剧等。一部《三国志演义》就能给人们不少的历史知识。中国人有几个不知道关老爷等“桃园三结义”的人物的呢？诸葛亮更是“大名垂宇宙”。一部《说岳》，又能告诉他们关于岳飞和秦桧的故事。《说唐》则讲的是唐代的故事。在中国，这类的书多得很。从这类的书中又产生了各地各种的戏剧。于是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就显然非常丰富了。至于这些知识可靠与否，那是不言而喻的。里面捕风捉影，添油加醋的东西，大量存在。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历史知识，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一类小说，不但影响了老百姓，连文人学士也逃脱不掉。清初诗坛祭酒大诗人王渔洋就曾写过过落凤坡吊庞凤雏的诗，为时人所讥。

建国以后，文化事业有了进步。为一般读者所写作的历史书籍，日益增多。据我个人的看法，通过小说和戏剧来学习历史知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。现在学习历史的方法和渠道大大地增加了。联想到我在上面讲过的历史的重要性，这个现象是十分值得欢迎的。

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独具慧眼，另辟蹊径，采用了一种新办法，达到供一般读者历史知识，特别是历代社会情况的目的。他们的办法是以每个朝代的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为中心，描述城市中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民情、风俗等等各方面的情况，由小见大，由近及远，藉以达到了解当时社会前进、历史发展情况的目的。这部《长卷》把学术性和趣味性结合或者融合起来，不讲干巴巴的历史事实，而能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美的享受中，把握住历史的脉搏，获得历史知识。《长卷》的作者们不是写小说，而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进行叙述的。这比以前利用小说和戏剧来学习历史知识，要好得多多了。我为中国的读者们感到无比的欣慰。

这一套丛书即将出齐。我祝它成功。我相信，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的。一个不懂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会知道去爱国的。这就是我一贯的信念。是为序。

目 录

卷前语 / 1

首卷 / 4

从冷漠中走出 / 4

甲编 / 15

樊楼灯火 / 15

名牌，宋五嫂鱼羹 / 27

黄金、牡丹与快乐仙宫 / 38

多彩的服务市场 / 50

乙编 / 62

最显赫的家庭 / 62

高超的平衡游戏 / 79

后宫微澜 / 94

丙编 / 109

走入社会之前 / 109

敬神与造神 / 122

庙会与术士 / 139

艺术，拥抱大众 / 151

市民爱憎的抒发 / 162

丁 编

快节奏的欢愉 / 173

美的争夺 / 186

男人与女人的组合 / 200

红颜多薄命 / 220

黑道 / 233

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/ 243

后记 / 249

重版后记 / 250

卷前语

街市上一片灰黑穿着的日子，早已过去了。如今，人们的服饰千姿百态，色彩纷呈。更可喜的是，再没有人为此写杂文、上广播，大发有伤风化的感叹。这就是历史的进步。

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，社会文化的需求也必然不断地上升、扩展。

历史学，属于高层次文化。然而它并不远离社会大众的视野。因为它面对的就是社会生活，是永无穷尽的昨天的社会生活。尽管每个不同的时代，都有特殊的生活规范与特殊的运行规律，但是昨天与今天之间毕竟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。许多正反、成败与悲喜的历史过程，许多真伪、善恶与美丑的历史比较，都能够为后人所理解和借鉴。所以人们从垂髫时代起，就开始在历史大观园里探游。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越高，“闲暇”越富有，人们猎取历史知识的兴趣就越浓烈。早些年，在香港闹市的缝隙间营筑了一座袖珍的“宋城”，后来，在古都开封又开辟了一条更宋代化的“宋街”。有的人去北京八达岭体验一番长城的历史氛围，觉得还不过瘾，竟要沿着长城全线去访古探幽。可见，在现代人们的生活情趣之中，探寻历史的奥秘，领略历史生活的风情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

历史学如何适应这种正在升高的社会文化需求呢？

有的学者正在写作实践中探索新的路子。笔者也常常与一些同行讨论这个问题。看来，除拓宽研究领域以外，更新研究方法、寻找新的写作形式，也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。

传统的史学方法，反映了历代不同阶段的水平，也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and 启迪。近40年来，我们学习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方法论，逐渐地走出了旧的传统，但是，走得并不轻松。许多隐含历史惰性的习惯、观念，还紧紧地缠绕着我们。有一种观念以为，只有在狭小专业沙龙中醇浓慢吸的著述才是学问。这就是把历史学引进狭巷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那种以为挤干了“水分”的朴学才是真学问的观念，往往使文章写得枯涩、滞板，如同城隍庙里的坐偶，生趣阙如。本文作为一个小序，不能专此深论。

为什么不能向司马迁学习，把一部究天人之际的鸿篇巨制写得生动活泼、通俗易懂，推向更广阔的社会呢？当今之际，至少在写作形式上必须结束那种单调的、乏味的“灰黑衣装”时代，体裁、手法都应逐渐地丰富





起来，使史学园苑也出现千姿百态、色彩纷呈的景象。

出于这种期愿，笔者愿意努力一试，希望学术性的历史选題也能步入较多的读者的生活。于是，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有所更张。

宋

既不能单纯依仗枯涩的逻辑论证，也不能停留在历史现象的平面铺叙，而是试图做到，历史逻辑的阐发相映于历史画面的流动之中。其实，这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，而是需要使丰沃的历史生活的美，得到适当的艺术表现。在这里，艺术的成分不是装饰，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可读性，而应该是尽可能使历史生活本身的美，表现得更鲜明、更真切一些。那末这种写作形式属于什么体裁？当然不是正襟危坐的专论，不是述而不作的记事，也不是浅平简介的史话，更不是松散飘逸的随笔。它，或许兼而有之，于是成了一种穿上随和、宽松、轻便装着的读物。

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，社会大众文化需求的支撑点也会逐步向高坡移动。不能老以为，大众需要的历史性读物，总是“杨家将”。我们必须寻觅介于大礼服与情侣衫之间的多式样的赏心悦目的装着。

写人物生平与朝代兴衰，也许更有利于探寻新的路子。可是笔者选择了辐射方位极广、球体式的城市生活。

最近半个世纪，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，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。我们这个泱泱大国，生齿最繁，人口基数比许多西方国家大几倍、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要使众多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，那是一个艰难得很的浩大工程。可是受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的催发，城市人口也达到了总人口的1/4以上，甚至将近1/3。1984年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1.9%（《中国统计年鉴》1985年）。原有的城镇飞速发展，新兴的城镇如雨后春笋勃起。

城市的发展，全方位地牵动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，衣食住行、工作学习、休闲娱乐都在变，一些传统的关系、传统的观念也在变。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关注起城市本身的变迁。

其实，城市只是一个历史的过客。在漫长的原始时代，人类奔突在莽莽榛榛的荒原上，没有城市。在遥远的未来，当高技术装备了各个领域，城市与乡村的差别逐渐淡化、消失，城市也就消失了。然而城市这个历史过客，至关重要。它负载着人类文明，乘风破浪，航行了几千年，它的每个历史脚印，就是每个时代的缩影。

我国城市的起源与流变，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。这里，我们只摘取了两宋时期（公元960—1279）这个片断进行考察。这300年间的城市发展，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历史阶段。各种历史的力量在相互冲撞碰击，社

会生活的许多侧面，发生了显著的变异、断裂，异彩纷呈，富有魅力。历史在随着奔竞的脚步向前走。这也是本书捕捉的主题。围绕这个主题，我们把笔触伸向了宋代城市的经济、文化、民俗以及政治等各个领域，企图展现一幅连缀的生活长卷。然而，这并非要对所有的部位进行全面扫描。

理想的目标，从来就不能一蹴而就。笔者乐于作一颗问路的投石。但愿有更多的人走出新路。





从冷漠中走出

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次大变，城市内部限制居民自由的坊墙，在北宋时期彻底崩塌了。

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初，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，不在黑暗的欧洲，不在酣睡的美洲，也不在尼罗河、恒河以及两河流域那些曾经拥有过古老文明的地方，而是在滔滔黄河的下游南岸。它就是我国北宋王朝的首都东京开封，也有人称它为汴京。这个荟萃了100多万人口的巨大社区，以“惊人耳目”、“长人精神”的无穷魅力（《东京梦华录·序》），屹立于时代文明之巅。

沉湎于享乐安逸的北宋王朝，后来被女真贵族的拐子马踏碎了。12世纪前叶至13世纪后叶，位于钱塘江口的杭州，作为南宋王朝的首都临安，取代了开封的地位，成了天下第一大城市。历史上声名最著的大旅行家马可·波罗，从意大利威尼斯来到东方。他亲自领略了杭州的风采之后，便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个“堪为世界城市之冠”的“天城”，称之为“令人心旷神怡熏熏欲醉”的人间天堂。（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第76章）

两宋300年间，东京、临安这两个超级城市，人口的高峰都远远超过了100万大关。风光旖旎的苏州、富饶锦绣的成都、位于南北东西交叉口上的交通枢纽鄂州（包括南市）以及濒临蓝色大海的巨港泉州，其居民数量也先后跳跃到40万、50万的水平线上。此外，北宋的西京洛阳、北京大名、长江岸边的江宁（南宋叫建康）、湘江之畔的潭州、东南沿海的福州、广州等，一批古老而又有新发展的城市，其居民数量也都达到过10万以上或者更多。

至于人口在1万至10万之间的城市，北宋不会少于100个。如宿州城，建隆元年一场大火灾就烧了民舍万余区。受灾人口就有几万（《宋史》卷63）。开宝七年，亳州永城县城火灾，烧民舍1800余区。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镇，总数大约3000个。

美国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L·沃思，把城市区分为6大类，再细分约20种。（《城市社会学》第10章）宋代城市当然不可能有如此繁细的类型。就它们的基本功能而言，可以分成两大类：一类是县以上政权机构所在的城市。它们是一个政治隶属关系的城市系列。但其中大多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城市。另一类是以工商活动为基本特征的镇集。它们不可能超脱于封建统治，但又不是封建政权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层次。它们的存在，不是政治的需要，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。

2

县以上的政治隶属城市有多少？

根据《元丰九域志》的记载，北宋神宗时，全国行政区划为：京府4，次府10，州238，军37，监4，县1135，州所辖监30。

但并不是各级政权所在地都是城市。广南西路昭州的昭平县，县治在漓江岸畔的荆棘丛中。这里“止有三家茅屋及一县衙，真所谓三家市也。有舟人登岸饮酒，遂宿茅屋家。夜半，觉门外托托有声。主人戒之曰：‘毋开门，此虎也。’奴起而视之，乃一乳虎将数子以行”（《岭外代答》卷10）。当然，这种极为荒凉的县治，只是边远地区的特殊情况，绝大多数县以上政府所在地都是城市。

在统计县（或相当县）以上城市时，有几个情况必须注意：

第一，一般情况下，府治、州治、军治所在的城市与一个县治重叠。如太原府治与阳曲县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。

第二，有13个州府城市重叠两个县治。如东京开封府重叠着开封县治与祥符县治。

第三，有11个军州监城市没有与县治重叠。例如秦凤路的岷州、兰州等城市没有县衙。

考虑以上三个情况，当时县（或相当县）以上城市应为：

$$1135(\text{县}) - 13 + 11 + 30(\text{州辖监}) = 1163$$





除了极少数像昭平县那样的，县以上城市总量至少在1150个以上。当然，这是个不稳定的量，到了北宋晚年，县以上城市，至少在1200个以上。

工商业镇集有多少？

宋

关于北宋小镇的数量，笔者曾根据清代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印冯集梧校订的《元丰九域志》统计，熙宁元丰间共有1884镇。这个意见写在1983年第一期《湖南师院学报》《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》一文之中。1984年，《元丰九域志》王文楚、魏嵩山点校本出版，笔者根据这个本子再次统计，小镇总数为1880个。不过，关于镇的记载，此书仍有遗漏。当时小镇总数肯定突破1900个。

南宋没有镇的全面统计材料。总的来说，南宋商品货币的活动并没有比北宋减弱，镇的发展状况，不会在北宋的基础上倒退。姑且以1900个镇扣除金王朝所占地区的小镇数量，南宋小镇的总量，至少有一千二三百个。

关于集市，宋代一般简称市。北方多称草市；南方，有的称墟市，有的叫步，也有叫草市的。少数的集市，颇具规模，如荆湖南路的储州市，可以与大县城匹敌。但一般集市是比镇更小的社区，它们处于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形态。

根据《咸淳临安志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宝庆四明志》和《嘉定赤城志》等地方志的记载，估计南宋有4000多个集市，从而推测北宋的集市大约有五六千个。

在自然经济居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，宋王朝的统治域内，涌现了如此众多的城镇集市，正是宋代城市发展的一种主要表现。

3

就城市的数量规模而言，大宋帝国不仅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，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和地区。例如11世纪的俄罗斯地区共有86个城市，13世纪达到250个。最大的城市基辅不过数万人。还有将近10个大城市，人口只有1万到2万。11—13世纪，西欧城市的居民数量，一般是0.5万至1万人。直到16、17世纪，拥有4万人口的伦敦，就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了。

对于宋代城市发展水平最能作出真切比较的，还是马可·波罗。他来

自西欧，又被忽必烈任命干了3年扬州总督。他还风尘仆仆，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城市。这位威尼斯商人的儿子，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许多城镇，对比度更加明晰。他到了苏州，就说：“苏州城，漂亮得惊人。”

“这里人口众多，稠密得令人吃惊。”就连二三流的城市襄阳，他也说，这是“一个相当大的城市”，“一个相当大的商业重镇”。（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第75章、70章）

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，一两万人的城市已经很大了，三四万人口的城市就大得出奇。当马可·波罗来到四五十万人口的苏州，怎能不惊得目瞪口呆！到了临安，他简直要晕倒了。因为当时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，绝对不会有这般气派。

城市，是人口、财富、智慧与享乐的集中。它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生息地，又是文明的主要载体。文明不喜欢鲁滨孙离群索居式的孤独漂流，也不大欣赏平静绿洲上的牧歌生活。它爱交流，爱竞争，爱嬉闹，爱冲撞。越是在相互依赖、相互砥砺、相互角逐的关系之中，它越能焕发精神，越能发展自己。

宋代成千成千的大小城市，不再是一些沉寂的政治孤堡，它们通过商品与文化的纽带，联结着，奔竞着，像一只庞大的船队，遥遥领先地驱驰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。

4

如璀璨群星的宋代城市，其内部的风貌如何？我们以北宋东京开封城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，因为首都是戴在帝国头上的皇冠。

公元前3—4世纪，这个处在“四战之地”缺少屏障的古老城市，是魏国的都城大梁。经过千百年岁月的撞击与改造，它延续下来。到了五代（公元907—960），特殊的历史机遇，使它先后成了后梁、后汉、后晋与后周4个局促而短暂王朝的都城。宋太祖赵匡胤在一场戏剧性的兵变中，仓促地抢占了皇位。当时有人建议把都城迁到长安、洛阳。经过一番犹豫之后，他决定继续以开封作为帝国的首脑都市。

宋代，除首都东京以外，还设立3个陪都：西京洛阳河南府、北京大名府、南京应天府。

东京，居住着以皇帝为首的庞大的权力集团。他们把持一个十分完备的庞大的官僚机器，卵翼着一个异常肥大的分享特权与安乐的寄生阶层。





因此，供养和保护帝室龙种、王公贵胄、高官大宦以及他们成群的嫔妃妻妾、成群的子孙苗裔，便是头等大事。至于居住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官符的富家巨室，自然也必须考虑满足他们享受性的消费需要与安全保证。

宋

对于安全问题，限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修筑固若金汤的高大城墙与护城壕沟。这一点，赵匡胤不必从头做起。东京城就像大围子套小围子、小围子套细围子，已经有了3层城墙。最里层是环护皇宫的皇城，周长5里，折今2300米。中间一层叫子城、牙城，又叫内城，周长20里，折今9200米。后梁、后晋、后汉的君主们，乃至后周的开国君主郭威，都在这个狭小的城池里，将就地做皇帝，气势颇为局促。到了后周世宗柴荣时代，因他



柴荣（921-959），五代时后周皇帝，954-959年在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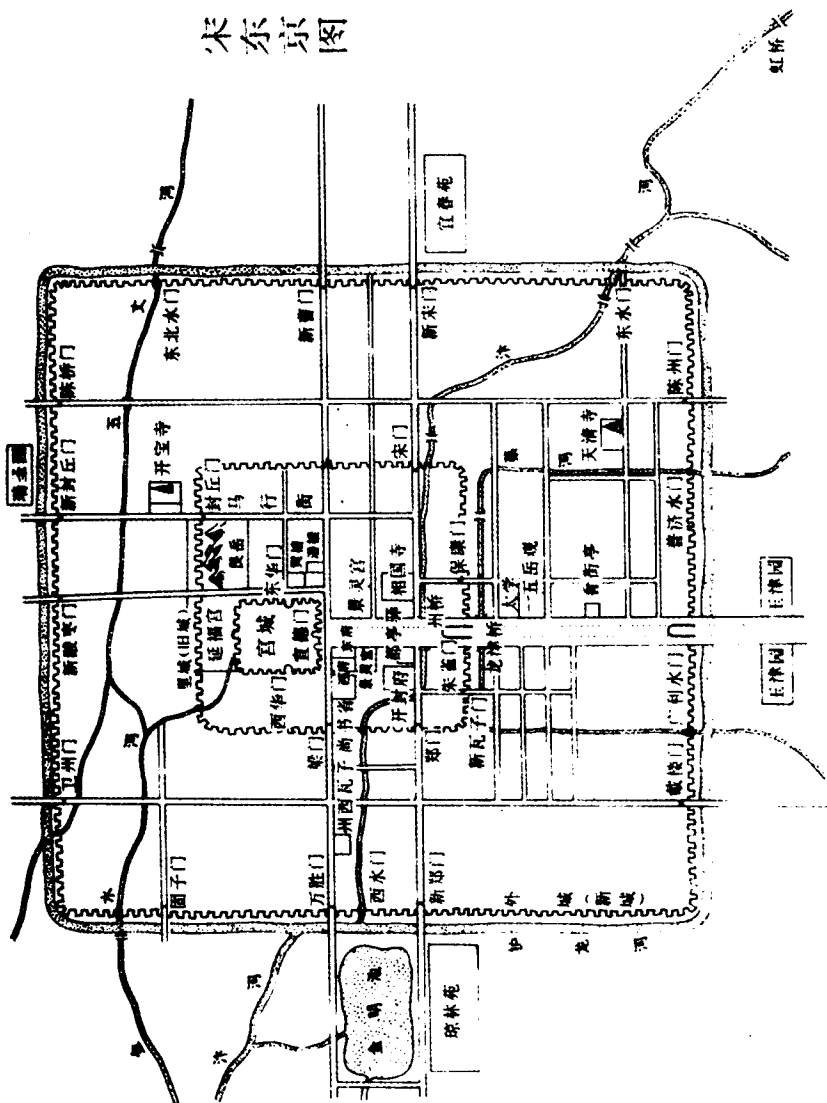
是一个颇具开拓精神的君主，政治上、军事上都有所作为，就为这个拥挤不堪的京都再筑了一层外城，又叫罗城、新城，周长48里232步，折今22436米。

对于这3层城墙，北宋时虽然累加修葺，却没有大事扩展。神宗元丰元年，费了400多万个工，外城增长也不到2里。直到北宋晚年，打算再筑一道更大的外城，周长80里。但还没来得及仔细筹划，风云突变，就把这个动念吹得无影无踪了。然而，市区的扩大已成为事实。

自唐代以来，南方农产品的输送，已成了帝国首都长安的生命线。由于供应上的不便，致使武则天、唐明皇这些颇有头脑的君主，不断地走出函谷关，到东边洛阳来过日子。最明显的好处是可以节省一大笔运输费用。宋太祖在这一点上算盘打得更精，连洛阳也不去，选择了开封。

通过汴河、蔡河、五丈河与广济河（又叫金水河）4条动脉，调集各地物资，每年从南方运送到东京的粮食高达600多万石。加上附近农村送来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，数量十分可观。各地的特产佳品，又源源不断向这里输送，真是“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，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”（《东京梦华录·序》）。特权阶层、富裕阶层的胃口，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。

宋东京图



宋

东京外城总共开了13座城门(包括水门),东南西北4面的正门分别叫“新宋门”、“南薰门”、“新郑门”与“新封丘门”。皇帝为了表现自己的至高无上,出出进进只走4张正门,称为“御道”。

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,居住建筑的最佳模式是坐北朝南。除了契丹族辽朝君主们坐西朝东以外,中原王朝的帝王们都接受坐北朝南的模式。他们高坐在金銮殿上,面朝南方,于是获得“南面之尊”的雅号。那末东京这4张正门,最为气派的自然数南薰门了。

进了南薰门,往北走,穿过内城的朱雀门直达皇城的宣德门,纵列着一条笔直而宽大的“御街”,极为壮观。御街全长七八里,宽200余步(其他大街宽30步)。1步5尺,御街宽度则为1000多尺。根据吴承洛推算,宋代1尺相当30.72厘米,那末,御街最少有307米宽。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特大型号的街道。

“御”者,皇帝专用之谓也。这条御街十分鲜明地表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等级秩序。街中心的“御道”,供皇帝专用,一般情况下,禁止其他行人车马通行。“御道”左右两侧,各有一条用砖石排砌的“御沟”。沟里种植莲荷,沟岸边交错地栽种桃、李、梨、杏。御沟之外,安装了一排红漆栏杆,划出了左右两条人行车马道,叫“御廊”。

一条300米宽的御街,就分割成了水陆5股,其中3股陆道,都是堂而皇之的交通大道,显出了帝国的赫赫威严。御廊边上就是临街的店铺、民居以及有关官署。在这些店铺民居之前,还有杂错的摊棚,商贩们十分活跃,而且逐渐地向御廊深里浸入。直到北宋最后10多年,才下令禁止在御廊中设摊交易。并且又布设了一道黑漆栏杆,保证车马的畅通。

“东风好作阳和使,逢草逢花报发生。”花信风吹过,生机十分旺盛的桃李梨杏,眨眼间,就疯疯癫癫地勃发了。红白相间,一片锦绣。真宗朝宰相陈执中的赋御沟诗写道:“一日春来一度新,翠花长得照龙津。”站在龙津桥上,满眼娇卉,寒意尚未消尽的御街,会变得十分温暖、十分精神。徒步在这七八里的长街上,吸吮着沁人心脾的花香,慢慢观赏沿街景物,更是一种特殊享受。